

域外

話本
詩珍

叢書

蔡鎮楚 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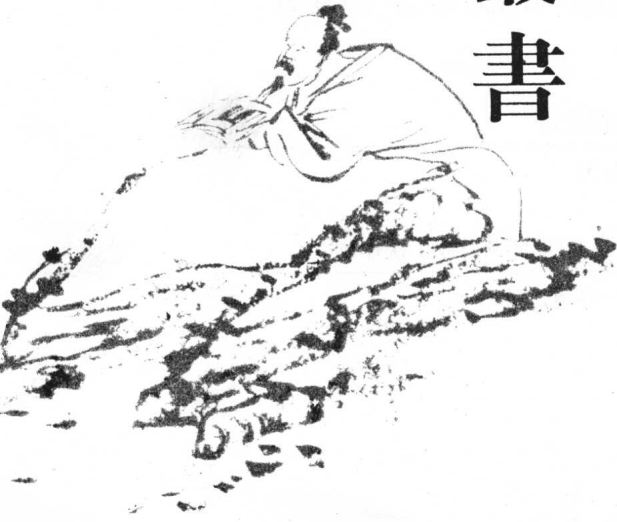


蔡鎮楚 編

北京國土館出版社

域外詩話珍本叢書

①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域外詩話珍本叢書/蔡鎮楚編。—影印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6.9

ISBN 7-5013-3196-0

I. 域… II. 蔡… III. 詩話—彙編—中國—古代 IV.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89438 號

責任編輯 王冠

封面設計 張希廣

ISBN 7-5013-3196-0



9 787501 331963 >

書名 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全二十冊)

著者 蔡鎮楚 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

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張 433

版次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3196-0/K·1415

定價 4600圓

序 言

蔡鎮楚

一 域外詩話與東方詩話圈

域外詩話者，中國境域外之詩話也。

此等「域外詩話」，是指中國詩話之外的古代朝鮮——韓國詩話、日本詩話與東南亞詩話等。我們編輯這套《域外詩話珍本叢書》，作為前此出版的《中國詩話珍本叢書》的姐妹篇，乃是第一次在中國大陸將古代朝鮮——韓國詩話、日本詩話的珍本文獻資料公之於衆，使從事學術文化研究的人們有一個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

此次編輯這套叢書，得益於日本學者池田胤編輯、日本大政八年（一九一九）東京文會堂刊印的《日本詩話叢書》十冊，是日本武庫川女子大學豐福健二教授一九九一年爲我複印而來的，還得益於韓國忠南大學校趙鍾業教授編輯的《韓國詩話叢編》十七冊。其他如韓國國立首爾大學校李炳漢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學船津富彦教授等海外友人，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贈送給我的韓日散本詩話文獻資料，上海張寅彭教授亦幫助良多。他們皆爲此套叢書編輯工作的奠基者，令我難以忘懷。

在中國詩話研究過程中，我們清楚地看到：詩話之體在中國宋朝繁榮發展之後，受儒家文化與佛教文化傳播之影響，隨即走出國門，走向世界，衍生出興盛一時的古代朝鮮——韓國詩話、日本詩話、越南詩話（文論）等，從而在世界的東方，從印度——中國——朝鮮——韓國——日本——東南亞地區，形成了一個以儒家文化圈與佛教文化圈為依託而又相互輝映的跨越歷史時空的「東方詩話圈」。

本來，印度屬於印歐語系的國家之列，不屬於儒家文化圈範圍，但其佛教文化與梵語詩學對中國文化與中國詩話的影響太大、太深遠。東方詩話圈的形成，不僅受到儒家文化圈的影響，同時亦受到佛教文化圈的影響。這個「東方詩話圈」，與儒家文化圈及佛教文化圈相互映照，在世界的東方形成一個巨大的文化奇觀，是中國儒家文化與印度佛教文化長期傳播與相互融合的產物，是東方文學批評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種不可忽視的跨越地區性與民族性的歷史文化現象。

由此可見，東方詩話圈的形成，依賴於四個基本的條件與人文語境：一是儒學，是中國儒家文化的傳播；二是佛學，是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國、朝鮮、日本與東南亞的傳播；三是漢學，是漢語、漢字文化的魅力與影響，使古代境外學者競相學習與研究運用；四是詩學，是中國古典詩歌特別是《詩經》與唐宋詩詞藝術以及中國詩話對國外詩人的影響。一句話，東方詩話圈，是中國詩話文化繁榮發展的必然結果。沒有繁榮昌盛的中國詩話文化，沒有中國詩歌與中國詩話的興盛，即使有一個儒家文化圈、佛教文化圈與漢字文化圈，也不可能出現一個東方詩話圈。

二 東方詩話的基本特徵

東方詩話，是一個客觀的歷史存在。而所謂「西方詩學」，淵源於亞里斯多德之《詩學》。其「西方詩學」之名，則出之於中國學者之口，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方在中國廣為傳播。比較而言，我認爲以古代中、朝、韓、日、越等國詩話爲代表的東方詩話，具有以下與「西方詩學」完全不同的審美個性與藝術特色：

其一，「詩話」名稱的相對固定性。依名稱而言，自歐陽修開創詩話之體以降，東方詩話之作大多襲用「詩話」之名，形成「某某詩話」的書名模式。論詩著作多以「詩話」爲名，「詩話」幾乎成爲中國、朝鮮、韓國、日本和東南亞地區論詩著作的通稱；衣鉢相傳，相續相禪，生生不息，表現出一種宗法文化的藝術特色。據不完全统计，現存一千七百部左右的古代中、朝、韓、日詩話之作（甚至更多），以「詩話」名書者多達一千部左右。如中國的《六一詩話》《中山詩話》《滄浪詩話》、韓國的《東人詩話》《清江詩話》《龜欄詩話》、日本的《濟北詩話》《詩山堂詩話》《五山堂詩話》之類。詩話之名陳陳相因，歷久不變，是儒家宗法文化與中國人注重祖先崇拜的文化心理的一種反映。而西方詩學與阿拉伯詩學，自亞里斯多德《詩學》之後，較少有人繼續沿用「詩學」之名，詩學著作的命名呈現出個性化、多樣化的特徵。

其二，詩話論詩條目的連綴組合性。論詩體制，如語錄，如隨筆，多爲語錄體式、隨筆體式，無論分卷分門者，均由一條一則內容互不相關的論詩條目連綴而成，各種論詩條目，長短隨宜，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應變作制，無須嚴密的結構布局，體制靈活多變，隨心所欲，少則幾條，多則數百條，具

有相當寬泛的隨意性，即使是葉燮《原詩》與日本江村綬《日本詩史》之類自成體系的詩學著作，也是語錄條目的自我擴大，正如清代著名文獻學家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所謂「挾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一樣。而西方詩學論著，大多是嚴密系統的理論著作，邏輯較為完整，結構體系比較嚴密。

其三，其詩學文化淵源，雖然有儒、道、釋三宗，是儒家文化、佛教文化與道教文化的三合爲一，但起主導作用的是儒家文化，其論詩主旨更多地表現出一種儒家化傾向。依論詩宗旨而言，大多遵循儒家風教之旨，以「詩三百」爲尚，高揚起「詩言志」與「詩緣情」兩面旗幟，論詩重教化，重情性，重人品，重比興，重含蓄，重意象，重意境。「詩三百」之影響東方詩話者，主要表現在：一則「詩三百」是飽含儒家詩教的經典之作，是東方詩話賴以誕生的詩歌母體與藝術搖籃。二則以「詩三百」爲尚，乃是東方詩話的論詩之宗。其宗旨在於孔子所倡導的「思無邪」，在於儒家詩教「溫柔敦厚」，在於「興觀群怨」，在於「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三則「詩言志」的本質屬性，極大地影響東方詩話的詩學觀念與批評標準。四則「詩」「六義」，所謂「風雅頌」與「賦比興」者，從題材內容與創作手法兩方面影響詩話創作思想與表現方法。五則《詩大序》與《小序》以其論辭與論事兩個角度，開中國詩話「論辭」與「論事」兩大系列，爲詩話之鍾派（以鍾嶸《詩品》爲宗）與歐派（以歐陽修《六一詩話》爲尚）以及日本詩話與朝鮮——韓國詩話之崛起，奠定堅實的基礎。而西方詩學大多注重作品的社會歷史價值與藝術技巧，詩學宗旨因人而异，因時而异，各種學說之間往往前後否定、互相排斥，缺乏中國詩學文化體系中那種內在的邏輯聯繫與思想內容的包容性。

其四，詩話論詩對象的詩化特性。依論詩內容而言，東方詩話以論詩爲主，屬於狹義的詩學；詩論祇是其一，而更多是論「詩」，其中之「詩」，主要是抒情詩，兼及敘事詩與詩化之文，而論詩，

既包括詩論，更多的是論詩之本事故實，論詩人生活方式與生活情趣，論詩歌創作所包含的文化義蘊。其內容大多分爲「論詩及事」與「論詩及辭」兩種類型。以其論詩方法而言，大多採用點悟、摘句、語錄、意象批評，要言不煩，點到爲止，不做嚴密的結構布局與邏輯推理。這種寫作方法，是中國先賢著述注重「語錄」體式、中國經學注重考據訓詁之學、印度佛教「象喻」與僧侶講經傳道注重「禪悟」的修行方式等，在詩話創作中的具體運用，無拘無束，無迹無形，無章無序，如羚羊掛角，無迹可求，語言通俗淺近，風格平易自然，侃侃而談，娓娓道來，饒有趣味，不象西方名牌的詩學著作那樣嚴肅正經，也不象《文心雕龍》那樣注重語言的駢儷化，讀之令人生畏。而西方詩學則以小說、戲劇、史詩之類敘事文學爲主要研究對象，名爲「詩學」，實爲文藝理論之通稱。

三 古代朝鮮儒學

在東方各國，最早進入中國儒家文化圈的是古代朝鮮。

古代朝鮮，有「檀君開國」的歷史記錄。如高麗時代僧一然的《三國遺事》與李氏朝鮮徐居正的《東國通鑒》等，都以檀君爲開國之君，稱檀君王儉「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都平壤城，始稱「朝鮮」」。

然而真正開化朝鮮者，是史書所記載的「箕子王朝」之說。箕子，商代貴族，商紂王諸父，官太師。賜封於箕（今山西太谷東北）。紂王無道，箕子力諫不聽，反被囚禁。周武王滅商後，被武王釋

放。箕子不食周粟，因有出走朝鮮之說^①。

《尚書大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司馬遷《史記》卷三八《宋微子世家》，班固《漢書·地理志》，兼之《東國史略》均作如是說。而《高麗史·地理志》則稱檀君都平壤爲「前朝鮮」，稱箕子朝鮮爲「後朝鮮」。今韓國保存的出土文物「孤竹壘」與「箕侯方鼎」，即是其歷史見證。而箕子入朝，其開化朝鮮之功，早已載入古代朝鮮的史冊。如《東國通鑒》云：

箕子率中國五千人入朝鮮，其詩、書、禮、樂、醫、巫、陰陽、卜筮之流，百工技藝，皆從而往焉。既至朝鮮，言語不通，譯而知之。教以《詩》、《書》，使其知中國禮樂之制、父子君臣之道、五常之禮。

箕子入朝，教以《詩》、《書》等儒學經典，是儒學東漸、儒家文化東傳的一大歷史文化事件，爲儒家文化圈之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唐永徽元年（六五〇），新羅大破百濟之衆。新羅女王金真德織錦作五言《太平詩》一首，特派遣其弟之子法敏敬獻給剛即位登基的唐高宗。其詩云：

大唐開鴻業，巍巍皇猷昌。

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

① 陳蒲清：《箕子評傳》，嶽麓書社二〇〇三年本。

統天崇雨施，理物體含章。
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時康。
幡旗既赫赫，鉦鼓何鏗鏘。
外夷違命者，翦覆被大殃。
和風凝宇宙，遐邇競呈祥。
四時調玉燭，七曜巡萬方。
維嶽降宰輔，維帝用忠良。
三五咸一德，昭我皇家唐。

這是李唐王朝的一曲贊歌，一曲域外新羅國王對唐朝赫赫國威的贊歌。李唐王朝時代，是中朝兩國進行全方位交流的歷史時期。

(一)文字。自箕子入朝，方塊漢字定為朝鮮人的通行文字，在朝鮮半島風靡一千三百多年，直到李氏朝鮮世宗頒佈「訓民正音」，命朝臣創制朝鮮「諺文」，漢字與朝文依然並行不悖。

(二)姓氏。據李重煥《八域志》：「新羅未通中國，始制姓氏，然僅土官與士族略有之，民庶則皆無。至高麗混一二韓，始仿中國，頒姓於八路，人皆有姓。」

(三)服飾。朝鮮民族從殷商人尚白，被譽為「白衣民族」。據《三國史記》卷二十三載，新羅「至真德王在位二年，金春秋入唐，請襲唐儀。玄宗皇帝詔可之，兼賜衣帶……自此已後，衣冠同於中國。」

(四)科舉。新羅統一三國，凡官制、郡邑均尊唐制，推行學制改革。神文王二年(六八二)，仿唐而立國學；元聖王四年(七八八)，「始定讀書三品以出身」，科目以儒家經書史傳為準，「讀《春秋左氏傳》、若《禮記》、若《文選》而能通其義、兼明《論語》、《孝經》者爲上；讀《曲禮》、《論語》、《孝經》者爲中；讀《曲禮》、《孝經》者爲下；若博通五經、三史、諸子百家者，超擢用之」(《三國史記》)。

(五)尊孔。據《三國史記·新羅本記》：「聖德王十六年(七一七)秋九月，大唐大監守忠回，獻文宣王(即孔子)、十哲(即配享文廟者)、七十二弟子圖，即置於太學。」因尊孔而奉儒，韓國有以「儒」名地者，大田市有「儒城」之名。

(六)出使。唐初武德七年(六二四)，刑部尚書沈叔安出使高麗，《全唐詩》存詩一首。此外，顧況有《送從兄使新羅》詩一首，以讚揚之辭寫其「封侯萬里外，不肯後班超」的志向。權德輿有《送韋中丞奉使新羅》詩，皇甫曾有《送歸中丞使新羅》詩，耿湣有《送歸中丞使新羅》詩，李益有《送歸中丞使新羅册立弔祭》詩，吉中孚有《送歸中丞使新羅册立弔祭》詩，錢起有《送陸珽侍御使新羅》詩，孟郊有《送新羅使》詩。

(七)留學。據《唐會要》卷三十六載，開成二年(八三七)三月，新羅人唐留學生共計二百一十六人；五年(八四〇)，新羅留學生與其他人員，一次歸國者就多達一百零五人之衆。《東文選》卷八十四載：「進士取人，本盛於唐。長慶初有金雲卿者，始以新羅賓貢，題名杜師禮榜。由此以至天祐終，凡登賓貢者五十有八人」(《送奉使李仲父還朝序》)。張喬有《送人及第歸海東》，杜荀鶴有《送賓客登第後歸海東》，張蠟有《送友人及第歸新羅》，許渾有《送友人罷舉歸新羅》，許彬有《送新羅客歸》，賈休有《送新羅人及第歸》《送新羅生歸本國》等。他們以詩會友，以詩會心，以詩唱

和，以詩相許，以詩相贈。詩是他們思想情感交流的橋樑，他們自然成爲了唐詩的傳播媒介。

(八) 求佛法。新羅人西行求法者，以慧超爲最。弱冠入唐，後泛舶南海，西行南亞中東求法，於開元十五年(七二七)返回安西。建中元年(七八〇)卒於中國。著有《往五天竺國傳》三卷。新羅僧人唐，與中國文人僧侶交往甚密，唱和賦詩，《全唐詩》收錄此類詩者比比皆是。孫逖有《送新羅法師還國》，張籍有《贈海東僧》，劉言史有《送婆羅門歸本國》，姚鵠有《送僧歸新羅》，皮日休《送弘惠詩》序曰：「庚辰歲十一月，新羅弘惠上人請日休爲靈鷲山周禪師碑，將還，以詩送之。」陸龜蒙作《和襲美爲新羅弘惠上人撰靈鷲山周禪師碑送歸詩》，顏萱有《送圓載上人》，張喬有《送新羅僧》《贈頭陀僧》《送僧雅覺歸海東》《送朴充侍御歸海東》《送人及第歸海東》，許彬有《送新羅客歸》，崔塗有《送僧歸天竺》，釋法照有《送無者禪師歸新羅詩》，釋貫休有《送新羅僧歸本國》《送新羅衲僧》，等。

(九) 醫藥。新羅接受中醫中藥甚早，於「國學」中開設醫藥課程，有《本草經》、《甲乙經》、《素問經》、《針經》、《明堂經》、《難經》等。新羅與高句麗醫藥書籍如《新羅法師方》、《老師方》亦傳入隋唐，其人參、牛黃、茯苓等名貴藥材即大量輸入中國。

(十) 曆法。唐高宗麟德年間，李淳風創制《麟德曆》。六七四年，新羅人唐專攻天文曆學者福德，回國後立即採用《麟德曆》。新羅國學，亦開設唐代中國天文曆法科目，培養天文曆法人才。後七二八年唐王朝採用僧一行等編制的更爲精密的《大衍曆》，新羅亦隨而改之。

(十一) 佛雕。新羅以佛教立國，注重佛像雕塑。古都慶州之郊的吐含山，佛像、寺塔林立。其佛國寺的佛雕，多爲唐代工匠所雕塑。唐代宗朝，新羅景德王曾命工匠以沉檀木雕「萬佛山」，以贈送唐代宗。

(十二)移民。古代朝鮮人移民中國唐代者，日本高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早有記載，稱唐代的揚州、楚州(淮安)、海州(連雲港)、登州(蓬萊)等地皆有「新羅坊」，為新羅僑民聚居區。其中登州之新羅館尤為重要，此乃唐朝與高麗之交通要道，被唐貞元間宰相、地理學家賈耽《皇華四達記》稱為「登州入高麗道」。

四 日本儒學

儒學東傳日本，以百濟為橋樑。晉武帝太康六年(二八五)，百濟華裔學者王仁攜帶《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赴日本講學。在此之前，已有百濟學者辰孫王、阿直岐留日。王仁精於儒學，應留日學者阿直岐之邀而赴日本，封為太子太師，並向應神天皇奉獻儒家經典《論語》，以《論語》、《孝經》教授皇太子菟道稚郎子。

王仁獻書授儒，是史載中國儒學東傳日本之端緒。此後，隨着中朝日三國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不斷發展，儒學在日本得以迅速發展。百濟留日學者辰孫王、阿直岐、王仁，被尊為日本「國初三儒」；公元六〇四年，聖德太子以儒學五常「仁義禮智信」和「德」字命名，制訂了「冠位十二階」授予日本貴族，次年又根據儒家學說頒佈《十七條憲法》綱要，以儒學治國，認為「無忠於君，無仁於民，是大亂之本」，強調「以和為貴」、「以禮為本」。

隋代大業三年(六〇七)，日本天皇指派小野妹子入隋進貢，從而拉開了中日兩國正式直接交往的歷史序幕。

據史載，李唐王朝是中日兩國交往最親善的時期。從六三〇年至八三四年，日本遣唐使凡十九

次，其中有四次未到達，有三次爲接送唐使而行，正式的遣唐使爲十二次。以六六三年八月唐日在新羅發生的「白江口之戰」爲界，前期日本遣唐使四次，以朝鮮半島的勢力瓜分爲政治目的，後期遣唐使八次，以政治文化交流爲目的。

據《日本高僧傳》載：「天平勝寶四年，藤原清河爲遣唐大使，至長安見元宗（按：元同「玄」）。元宗曰：「聞彼國有賢君，今觀使者趨揖有異。」乃號日本爲「禮儀君子國」。命晁衡導清河等視府庫及三教殿，又圖清河貌，納於蕃藏中。及歸，賜詩。」唐玄宗此題爲《送日本使》的詩曰：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

念余懷義遠，衿爾畏途遙。

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颺。

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在外國使者中，新羅與日本使者最爲精通漢學。因而與唐代詩人的關係更爲密切。孟郊有《送新羅使》詩一首，徐凝有《送日本使》詩一首，等等。

朝衡（六八九—七七〇），即晁衡，日本奈良人。唐玄宗開元五年（七一七）隨遣唐使人唐，歷官左補闕、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等。與王維、李白、包佶等詩人交遊甚深。天寶十二年（七五三）與藤原清河等同船回日本國，王維作《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趙曄（一作曄）作《送晁補闕歸日本國》、包佶作《送日本國聘賀使晁巨卿東歸》詩送行。在回國途中，因海上遇險，李白以爲晁衡已遇難，懷念之心悲痛不已，故作《哭晁卿衡》詩以弔唁之，詩云：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
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然而，晁衡命大，落海後，漂到中南半島，後輾轉折回長安。先後在唐朝京都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大曆五年（七七〇）卒於長安。

日本留學於唐代中國者，亦為數甚多。有留學生與留學僧，有時一次竟多達五百餘人（《續日本紀》卷二十一）。最著名的是遍照金剛即空海（七七四—八三五）大師。唐貞元二十年（八〇四）入唐學密教，遍收中國詩格、詩評、詩式之類典籍，回國後編輯《文鏡秘府論》六冊，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被日本學者尊奉為「日本詩話之祖」。

五 東方漢詩

儒學東漸，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古代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國的漢詩創作日益繁榮發展起來，為古代朝鮮詩話、日本詩話、越南詩話之崛起奠定了詩歌藝術基礎。

所謂「漢詩」，是指古代外國人運用漢語、漢字和中國古體詩詞格律而創作的一種詩歌藝術形式。其基本特徵：一是以漢字為詩，東方漢詩，是漢字文化外傳的產物；二是恪守儒家詩教之旨，以「詩三百」為圭臬，深深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三是漢語聲律為基礎，遵守中國古體詩詞格律，是漢語音韻學的文化載體與傳播媒介之一。

古代朝鮮、韓國與日本，是世界漢詩創作的的主要基地。他們從事漢詩創作的整體水平與藝術成就，僅僅次於中國本土。

漢詩創作，以古代朝鮮——韓國為最早。崔豹《古今注》稱四言詩《筮篥引》為「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其卷中云：

《筮篥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櫂。有一白首狂夫，被發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而不及，遂墜河水死。於是援筮篥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淒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筮篥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墜淚飲泣。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筮篥引》。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墜河而死，當奈何？」

故此曲亦稱之為《公無渡河》，其歌詞如泣如訴，如歌如怨。韓國學者多以此為朝鮮漢詩傳世之作中的「最古者」。

朝鮮進入三國時期，先後依照中國教育體制設立太學，以《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左傳》為業，漢字、漢詩廣為傳播。如前所述，唐太宗置弘文館，三國特別是新羅人唐留學者甚眾。朝鮮漢文學史上聲名顯赫的「四大漢詩人」，都受過儒學的教育培養。其中新羅人崔致遠（八五七—？），十二歲入唐留學，十八歲中進士，授溧水縣尉。後入高駢幕府，作《討黃巢檄文》。

著有《桂苑筆耕集》二十卷。末卷爲漢文詩，凡三十首。二十九歲歸國，立志改革，失意後隱居伽耶山。被譽爲「東方文學之祖」（《小華詩評》），詩與李齊賢、李奎報並稱爲「東國三大詩人」。李奎報被譽爲「朝鮮李太白」（《東人詩話》），李齊賢被譽爲朝鮮的「漢詩宗」，李氏朝鮮的申緯被譽爲朝鮮的「詩佛」而與唐代王維同列。

朝鮮——韓國漢詩源於中國。衆多的朝鮮漢詩作家不僅到中國留學，而且詩事中國詩人、學者，耳濡目染，情誼深厚，成爲儒學與漢詩傳播的文化使者。《全唐詩》收錄此類詩者比比皆是，如章孝標《金可紀歸新羅》詩云：

登唐科第語唐音，望日初生憶故林。

鮫室夜眠陰火冷，蜃樓朝泊曉霞深。

風高一葉飛魚背，潮淨三山出海心。

想把文章合夷樂，蟠桃花裏醉人參。

「登科第」、「語唐音」、「合夷樂」，這就是當時新羅學人人唐留學的真正動機與目的，也反映出唐人與外國學人交往的思想文化基礎。

興盛一代的朝鮮——韓國詩話，就誕生在古代朝鮮——韓國以漢詩爲主體的漢文學創作的文化思潮之中。